

三股合力之下的话剧艺术

穆海亮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话剧危机之声就不绝于耳。理论界和艺术家纷纷为其查找病源,于是就有所谓“审美观念转变说”“影视艺术冲击说”“多元文化消费说”云云。如果说是审美观念的转变、影视艺术及多元文化的冲击导致了话剧观众的流失,进而引起话剧的危机,这实在并不能令人信服。从发生学角度讲,戏剧(包括话剧)源于人类的摹仿、表现、观赏及情感交流的本能需要,只要这些需要没有随着审美观念的转变或多元文化的兴起而消逝,人们就不会放弃戏剧。舞台上演员之间的身心碰撞、舞台上观演之间双向互动的诗意交流、剧场之中的“三角反馈”所产生的巨大情感冲击力,永远是电影院或客厅里冷冰冰的屏幕所无法取代的。证之以欧美发达国家,其影视、大众文化均极繁荣,但谁见欧美戏剧有多危机?就像绘画艺术不会因照相术的发

明而丧失意义一样,“手抄本”的话剧艺术也不会因“机械复制”的大众文化的冲击而走向衰亡。但是,中国话剧的危机却是不争的事实,其根源何在?要寻找中国话剧危机的根源,关键在于找出影响中国话剧发展的文化变量。我以为,中国话剧是处于三股合力之下的艺术创作;艺术追求、社会效益和商业市场意识。当三者处于良性互动时,中国话剧就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和蓬勃的创造力;当三者的关系失调,某一方过于强势或过度萎缩之际,话剧便由于“场”之合力的扭曲而陷入困境。所谓的良性互动,并不是指完全一致或重合,完全合一意味着艺术的死亡,而是指既保持矛盾,又互相制衡,其中的张力才是艺术创作的真正动力。证之以百年中国话剧史,早期话剧文明戏的鼎盛时期,因为市场短暂而畸形的过度繁荣撕裂了知识精英的文化坚守,于

是就在昙花一现的所谓“甲寅中兴”之后迅速衰落;继之而起的是“爱美剧”则走向另一个极端,以文化精英的孤芳自赏来堵塞商业的侵蚀,这当然亦非话剧正途;抗战时期是中国话剧公认的黄金时代,因为时间的偶合,让人感觉似乎是战争促进了话剧的大发展。其实,这是职业化的演剧运动促进了三股合力的多维互动,抗战救国的政治激情、供需两旺的市场效应和文化精英的民族化创造,共同营造了话剧创作的“常态”。而在当下,市场意识逐渐觉醒,话剧则形成了“两翼齐飞而独缺主干”的尴尬局面。一方面是社会层面强势介入,一方面是商业利益搔首弄姿。在这种情况下,外在束缚激活了某些文化精英的内在分裂,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两面性就凸显出来。他们反对一切权威,却又希望把自己树立为权威;企图代表公共立场,却又丝毫不顾及自我利益;既有坚持艺术操守与精神独立的愿望,又难以摆脱追求利益、向往权力和避免风险的冲动。所以,知识精英终于未能抵御市场与市场的双重诱惑,而趋向于两种迎合:迎合社会尤其是某些官员意志以求名,渴望在各种评奖中斩金夺

银;迎合市场需要以求利,甘于打造庸俗讨巧的话剧快餐。精英艺术社会化,先锋艺术商业化,就成为了一种必然趋势。所以,当话剧某些危机的根源就在于创作主体意识失落,思想的贫乏造成创作的羸弱,立场的丧失导致批评的失语。创作的贫乏是当下话剧某些危机的直接原因,而观众的流失只不过是它的表现与必然结果而已。社会对此很焦虑,于是更加强烈地呼吁主流意识的感召;市场对此也很焦虑,于是只能集中于极少数特大都市,以高投入、高票价、高回报,维持话剧市场的“高位”运作。这又反过来更加限制了文化精英的创造精神,也阻塞了话剧艺术走向大众的通道。话剧艺术要繁荣,首先是创作要发展;创作要发展,首先是思想要解放。而要解放思想,就要营造发展繁荣的文化空间,建立良性循环的市场秩序。在此基础上,鼓励艺术家以积极的思考和独特的表达,探询人类灵魂的精髓,又难以摆脱追求利益、向往权力和避免风险的冲动。所以,知识精英终于未能抵御市场与市场的双重诱惑,而趋向于两种迎合:迎合社会尤其是某些官员意志以求名,渴望在各种评奖中斩金夺

银;迎合市场需要以求利,甘于打造庸俗讨巧的话剧快餐。精英艺术社会化,先锋艺术商业化,就成为了一种必然趋势。所以,当话剧某些危机的根源就在于创作主体意识失落,思想的贫乏造成创作的羸弱,立场的丧失导致批评的失语。创作的贫乏是当下话剧某些危机的直接原因,而观众的流失只不过是它的表现与必然结果而已。社会对此很焦虑,于是更加强烈地呼吁主流意识的感召;市场对此也很焦虑,于是只能集中于极少数特大都市,以高投入、高票价、高回报,维持话剧市场的“高位”运作。这又反过来更加限制了文化精英的创造精神,也阻塞了话剧艺术走向大众的通道。话剧艺术要繁荣,首先是创作要发展;创作要发展,首先是思想要解放。而要解放思想,就要营造发展繁荣的文化空间,建立良性循环的市场秩序。在此基础上,鼓励艺术家以积极的思考和独特的表达,探询人类灵魂的精髓,又难以摆脱追求利益、向往权力和避免风险的冲动。所以,知识精英终于未能抵御市场与市场的双重诱惑,而趋向于两种迎合:迎合社会尤其是某些官员意志以求名,渴望在各种评奖中斩金夺

时评

前不久,在网络上传出所谓“内地作家”张某某“以60万美元贿赂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的传闻之后,引来当事人马悦然的断然否认和愤怒回应。此事本已澄清并告一段落,但张某某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说的一段话,却引起笔者的深思。他说:“因为我了解现在在我国国内的许多文学大奖,当然也包括娱乐圈的,都可以‘买奖’,于是便产生了买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的想法。”张某某的想法非常可笑,但为什么他会产生“买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这种想法?而又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人相信“买诺奖”的传闻,甚至连某某大学的名教授也在微博中转发?归根结底,还是由于“我国国内”的某些文学奖的公信力不足,以致人们们的争议多了,无论什么“奖”的评选方式,也都会产生疑惑。

缺乏公信力,就会缺少美誉度。人们经常爱引用这样一句话:“金奖银奖,不如群众的夸奖;金杯银杯,不如群众的口碑。”从某种意义上说,“金奖”“金杯”与群众的“夸奖”“口碑”成正比的时候,其公信力和美誉度就高;而成反比的时候,其华美包装和绚丽光环下的公信力和美誉度,就很成问题。现在国内的文学奖项,确实有“许多”:省里有省级的文学奖,地市级有地市的文学奖,文学报刊和文学网站也有自己的文学奖项,企业和基金会也在颁发各种名目的文学奖……实事求是地说,这些奖项在鼓励作家、发掘佳作、培养队伍、扶植人才等多个方面,确实发挥了各自重要的积极作用。而这些奖项的设立,也为公众加强对那些埋头创作、不务虚名的写作者的真正了解和认知,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路径。这“许多”奖项当然不一定如张某某所言“都可以‘买奖’”,但近年来某些奖项评选之后在公众中引起的质疑和批评,也确实

是屡见不鲜的。这些“奖”的

严化和市场化倾向,更是极其严重——评委和获奖作者“近亲繁殖”的现象有之,评委和出版商利益捆绑的关系有之,甚至红包评委、歪嘴评委的或真或假的消息也时有耳闻。

文学创作是个人化的,而文学奖则是公共化的,其评选过程应该公平、公开、公正,绝不能搞“小圈子化”,更不能搞“个人化”“金钱化”。怎样增加文学奖的公信力,已经成为摆在各类评委面前的一道必答题。要回答好这道必答题,需要无私的“铁面”——对任何作者都不能徇私情;需要灵巧的“妙手”——能够准确把握评判的尺度和标准;需要明亮的“慧眼”——能够从沙粒中发现金子,在枯草中找到灵芝;还需要有一颗“仁心”——心中要有阳光,要传递温暖和爱,而不是传播毒藤和罂粟……

说到国内的文学奖,我个人一直比较尊重的是茅盾文学奖。从《东方》、《芙蓉镇》、《李自成》到《白鹿原》、《抉择》、《暗算》,一路读来,那些获奖作品留在人们心里的,大都是美好的艺术享受。该奖评选至今,已经30来年了。目前第八届参评作品正在进行公示。共有180部作品符合《茅盾文学奖评奖条例》所规定的参评条件。参评作品目录已在相关媒体公布,并接受公众监督。在该奖项的评奖条例中专门提到“坚持导向性、权威性、公正性”,还提到“努力推出体现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思想高度和艺术水准的优秀作品”。茅盾文学奖的分量,是和其评奖过程中的“导向性、权威性、公正性”成正比的。其“导向性、权威性、公正性”,也正是增加文学奖公信力的必要途径之一。祝福那些获得参评资格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希望同时也相信,这些作家不会有张某某那种“使一些钱”就能“买个大奖”的猥琐想法。

读者心中有杆秤,大钱

是钱能评?儿,吃“百家饭”长大,受到党和政府深切的关怀和爱。他的“我把党来比母亲”的名言,是发自肺腑的真挚情感。雷锋离开了我们,雷锋所生活的那个时代虽然已经远去,但他的精神将永葆青春。

重读红色经典

——纪念建党90周年

视点

基层学者的文化重任

本报记者 刘 茜

5月29日,由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浙江省作家协会、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王学海理论研究暨文学创作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中国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王潮出席。来自文学界的30多位专家就浙江海宁学者王学海的艺术理论与文学创作进行了研讨。主办方介绍,这是首次为基层文联的文艺工作者举办高规格的学术研讨会,这表明了中国文联对基层文艺工作者的重视与支持。王学海是海宁文联副秘书长,兼任浙江省作协文学评论委员会副主任。浙江省作协党组副书记郑晓林说,作为一位基层学者,王学海具有综合性强、研究面广、学术突出的特点。王学海看上去一副文弱弱的样子,其实却很精干。自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文学创作以来,笔耕不辍,涉猎小说、诗歌、散文、文艺评论等多种文学样式。他出版专著6部,散文集2部,在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60多篇,文章多次被《新华文摘》转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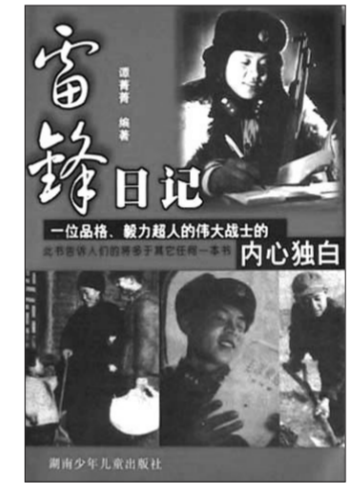
在学术研讨会上,与会的专家认为王学海的艺术批评具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比如,他在学术专著《文学前沿:精神与问题》中谈及对当代文学发展的期待,强调了“作家的高度敏感与社会责任感”问题,指出,当代作家必须重视创作有社会意义与美学高度的经典作品。在谈到文学的永恒性时,他认为关键在于精神的深度开掘。王学海的文学理论批评与文学创作并驾齐驱。他坚持生命质感和时代性格对作家的的重要性,文学创作理应具备一针见血的理论阐述穿透力是他的创作追求。由于身处基层,他的文学创作贴近生活,有底层与当下生存现状的关注。组诗《为生灵的蜕变理单》针砭时弊,强调食品安全对百姓生活的重要性。《黑砖窑》:“睡梦中仅有的/几个呼噜,是一个个黑沉沉的秤砣/压住一座座砖出人倒的坟墓”“他们活着,是因为砖的流动/他们沉默,是因为法律沉默”。揭示环境污染及背后的监管问题,并为“黑工”的生存状况发出沉重的呻吟。作家何建明评价王学海不仅是文学创作者,还是有美学意识的重视社会责任感的理论批评家。基层文艺工作者的人才培养应引起人们重视,希望涌现更多的具有真才实学的基层人才。王学海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缺乏大气与雄浑。一些先锋派作家单纯地玩弄写作技巧,却轻易丢弃了对生存、社会、人性的关注。然而,文学作品是作家个人的,但它又是社会的,是社会群体的精神滋补品。文学作品应以艺术语言的独特魅力给予人们忠告。他说:“真正的文学作品绝不是比技巧、比形式,文学提供给人的应是灵魂的关怀和诗性的拯救。折射时代的焦虑,揭示生态危机与精神的堕落。”

重读《雷锋日记》

陶建勇

我从书橱里翻出那本封面已经发黄的《雷锋日记》。打开扉页,凝视着雷锋充满笑意的面容,突然有一种久违的春风扑面之感。书中描述“今天我从营口乘火车到兄弟部队作报告,下车时,北风刺骨地刮,地上一层雪,显得很冷。我见到一位老太太没戴手套,两手捂着嘴,嘴里吹一点热气温手。我立即取下了自己的手套,送给了那位老太太。她老人家望着我,两眼含着热泪,半天说不出话来……一路上,我的手虽冻得像针扎一样,心中却有一种说不出的愉快。”这样美好的画面,如此动人的情景,在雷锋生命的画卷里还有很多很多!是什么精神让这位只度过22年短暂人生岁月的青年战士,却具有如此高尚的情操呢?多年

之后,我好像才发现了这部红色经典,抑制不住渴求真理的渴望,把目光慢慢地游弋在他一页一页的日记里,一天天、一遍遍地重温他那感人至深的桩桩善举、暖暖情愫。“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我觉得自己活着,就是为了使别人过得更美好。”“我是人民的一名勤务员,自己辛苦点,多帮人民做点好事,这就是我最大的快乐和幸福。”……多么感人的话语!“自己辛苦点,多帮人民做点好事”“为了使别人过得更美好”,这难道不是中国传统的“推己及人,仁爱待人”的道德规范吗?由于雷锋精神产生自那个特殊的年代,某些地方把学雷锋搞



成一场运动,由自发变成了命令,由主动变成了被动,某些媒体把雷锋精神化为“共产主义超人”,把他的一些事迹说得神乎其神,提供了一种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模板。久而久之,也就使人们产生了逆反心理,进而,大公报、先公后私就没有人提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不大讲了,雷锋在一些人的眼中竟成了傻瓜,变为讽刺好人的风凉话。一事当前,某些人首先考虑的是一己的得失……

动态

专家为小剧场戏剧出招

本报讯 (驻北京记者王晓风通讯员李雷)近日,由北京戏剧家协会、中国话剧艺术研究会等主办的“原创小剧场戏剧系列论坛”在北京东联艺术公社举行,就小剧场艺术当前困境与未来发展做了讨论。北京戏剧家协会秘书长杨乾武介绍,近年来小剧场戏剧遭遇严重滑坡,投资主体不专业,一些创作者过分追逐商业效益,导致作品良莠不齐,伤害了很多观众的观剧积极性。人们对小剧场戏剧也就产生一些误会:“一是主流戏剧界,他们认为小剧场是娱乐的,是市场的;二是投资人,他们认为小剧场演出只能靠搞笑、恶搞。”另一现实是众多小剧场戏剧剧目重复、优秀原创剧目贫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平指出,低俗、恶搞、泛娱乐、低级炒作的剧目占领了小剧场半壁江山。对于小剧场话剧剧本来说,抛弃戏剧的高标准,一味

市场化,依赖噱头而不是舞台功力取胜,直接后果就是本身造血功能的迅速衰退,这种苗头对戏剧的发展有害而无利。杨乾武还指出,场租昂贵也制约了小剧场戏剧。我国小剧场戏剧本来根基就不厚,处于培育市场的起步阶段。他建议:国家应该在创作之前就对有追求、有潜力的剧团进行扶持。会议认为,破难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更好地培育观众;二是打通演出产业链形成固定的合作关系;三是尝试在北京建立小剧场联盟,在经营模式上相互联合,像影院一样形成院线联合,资源共享,而不是各自为战,争夺市场资源。先锋剧场总经理傅维伯倡议,小剧场戏剧经营管理要与国际演出服务标准、技术管理标准等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相对接,至关重要。

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浙江的第一大剧种越剧的表演团体生存状态呈现出“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的境况,不少专业剧团发出感叹:百年的传统越剧面临严峻的挑战,年轻人不爱看,中老年人很少买票进剧院看越剧,越剧的演出市场在日渐萎缩。然而,在浙江农村,传统越剧依然有着广阔的天地,民间职业剧团进村入巷,在希望的田野上演一台大戏,越音委婉绵延,水袖款款飘忽,生命力旺盛,一年中,除了天气炎热的7、8两个月,其余时间都在演出,形势喜人。以浙江为例,民间职业剧团之所以大有市场,有几个方面原因:

“点单式”的服务

民间职业剧团去哪里演出,一般都是由经纪人牵线搭桥的,经纪人随身带着一份戏单,剧团能够上演的戏少则60台,多则百余台。经纪人与村里的老年协会负责人联系,送上戏单,让对方负责“点单式”服务,想演什么戏,悉听尊便。点单过程中,获大奖的剧目不一定受欢迎,理由是:“这台戏不够热闹,没啥看头。”如果对方希望欣赏戏单范围外的剧目,只需5天前告知剧团,剧团就能排练出有模有样的戏。他们首先请导演把戏中的情节完整地讲述一遍,然后就由导演分派角色,并给每个分到角色的演员发一张DVD,大家各自按照扮演的角色,在演出的空余时间练唱腔、练对白、练台步。在此基础上,剧团组织一次彩排,让导演从头至尾指

点一番,就能登台亮相了。

这种“点单式”服务凸现了民间职业剧团的优势,而且,剧团的演出费不高,老年协会或在全村挨家挨户筹集,或请村里事业有成的老板捐助,或者请村支两委批准,由村里支付,经费问题不难解决,使剧团有了很大的空间。

“一专多能”的演员

在民间职业剧团里,没有端“铁饭碗”的演员,剧团在每年七八月间都会淘汰一部分演员,同时招收一批优秀演员。剧团招收演员的标准是:既能演越剧,又能歌善舞,一专多能,目的是用时尚的歌舞节目吸引年轻观众,拓展观众层面,增强影响力。剧团内部形成自觉钻研演技、迫切希望提高自身素质的力求上进的氛围,上台演出时使出浑身解数,无论是主角还是龙套,都会聚精会神地演好每一场戏。在农村演戏,没有明确的时间规定,每场戏的演出时间一般保持在3至3个半小时,如果小于这个时间,老年观众就会抱怨不够过瘾,如果超过3个半小时,大家就觉得剧团在演出的空余时间练唱腔、练对白、练台步。在此基础上,剧团组织一次彩排,让导演从头至尾指

民间职业剧团大有市场

陈澄

活力迸发。

一专多能的演员,劲歌热舞与传统越剧的差异化组合,演员们的活力迸发,老年协会或在全村挨家挨户筹集,或请村里事业有成的老板捐助,或者请村支两委批准,由村里支付,经费问题不难解决,使剧团有了很大的空间。

“零门槛”的演出

尽管农村的父老乡亲早就能够从电视、影碟中欣赏到各种流派的越剧,但是,如果村里决定演戏,大家还是奔走相告、呼朋唤友,兴奋不已,越剧给村民们带来的精神享受不单单是欣赏,还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和着唱腔唱几句,看到动情处洒几串热泪,是戏迷们最大的乐趣。哪里需要演出,民间职业剧团就奔向哪里。某村的一个小戏场建成了,请剧团演几场戏庆贺一番,剧团一口答应;某乡举行圆桥庆典,请剧团演出助兴,剧团随叫随到;有村民为长辈祝寿,出资请全村人看戏,剧团在演出中巧妙地插入祝寿的元素,使老年人倍感开心。遇到演出地点山高路远,车子无法通行,演员们就背着服装道具徒步前往;村里条件差,无法安排演员住宿,演员们就睡在戏台上。民间职业剧团的“零门槛”演出服务深受农村群众的赞许,剧团的前景不但不会黯淡,反而

会越来越好了。

但是,伴随民间职业剧团的发生发展,也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是剧团总量大,但质量却未能有相应保证。一些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对剧团的审批过于宽松,对申办剧团所必备的条件,如资金、演职人员的数量和从业资质等未进行认真严格审核便予以批准开办,也未对已审批剧团的经营状况进行有效管理,放任自流。另外,经过专业培训的具备从业资质的演职人员偏少,好演员更是稀缺。

二是无序竞争,演出市场存在混乱现象。由于好演员稀缺,剧团间竞相以提高报酬等种种手段“挖”演员,导致演员频频跳槽的情况大量存在。演员跳槽,导致剧团不稳定,经营者也不愿花气力培养演员。也由于剧团总量大,致使一些剧团,尤其是质量较差的剧团以低价竞争演出市场,造成戏金偏低,加上演员报酬不断提高,以致不少剧团陷于勉强维持,甚至亏本经营的状况。一道具徒步前往;村里条件差,无法安排演员住宿,演员们就睡在戏台上。民间职业剧团的“零门槛”演出服务深受农村群众的赞许,剧团的前景不但不会黯淡,反而

应该说,演出经纪人对于传达演出信息、沟通剧团和请戏人之间关系、活跃演出市场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但是,由于其中相当一部分人素质较低,且都未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而私自经营,有些还和黑恶势力有紧密联系,对申办剧团所必备的条件,如资金、演职人员的数量和从业资质等未进行认真严格审核便予以批准开办,也未对已审批剧团的经营状况进行有效管理,放任自流。另外,经过专业培训的具备从业资质的演职人员偏少,好演员更是稀缺。

三是黑中介猖獗,欺行霸市。还有随意篡改、买卖和盗用他人剧本,著作权意识淡薄等问题。存在以上几个方面的问题,我以为最主要原因是有关部门管理的缺失。这些部门的一些同志尚未真正认识到民间剧团生存与发展的意义和价值,也未很好地认识到政府对这块演出市场应负的调控与监管责任。另外,在税费改革后,一些地方的文化管理部门因在民间剧团和演出市场收不到管理费,既失去管理的积极性,也缺少必要的管理经费。我认为这些是前进过程中不可避免出现的问题,相信在各级文化部门的重视与支持下,民间职业剧团通过坚持不懈的辛勤耕耘,其道路一定会越走越宽阔。